论生活的意义建构性

高德胜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南京 210097)

摘要：人生而“有病”，总是固执地探求着生活的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命有限，人有“死亡意识”。但生活的意义不是发现的，而需要以他人为参照进行创造。

关键词：生活;意义建构

道德教育回归生活，或者更直接地主张生活德育论，在教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是理论上的，还包括实践上的，比如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以及初中《思想品德》国家课程标准都明显地以回归生活为基本理念之一。但对道德回归生活或生活德育论，理论界仍然有这样那样的争议和质疑。应该说产生这种争议或质疑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任何一种理论观点都是“相对真理”。所谓“相对真理”，既是指一种理论对提出者来说可能是“真理”，但对其他人却未必如此；也是指一种理论，其解释力也是相对的，无论是理论的周严性还是实践的有效性都不是绝对的。因此，理论界的这样质疑对生活德育论的研究是非常具有促进作用的。但这种质疑也有误解：“生活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如果生活本身是低俗的，你也要回归这种生活吗？”这种误解实际上混淆了形而上下的现实生活和作为形而上的生活概念之间的差别，忽略或者说没有理解作为哲学概念的生活本身是具有意义建构性的。当然，这种误解也促使我们对生活进行研究和界定，本文是这种研究的开始。

艾温·辛格认为意义一般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认识上的，另一层是价值上的。当我们在上认识的意义上使用“意义”一词时，我们是在寻求某种解释，是要阐明某种事情或某个事件；另一方面，我们使用“意义”一词时，往往和个人的情感和情绪有关。它揭示、表明我们的最高价值，体现出我们所怀抱与追求的理想，这理想是我们行动的目标和生活的依据。（辛格，第 26-27 页）生活的意义当然离不开解释和说明，但生活的意义主要不是解释和说明所能建构的，生活的意义需要创造，是我们永不停歇的价值追求。

一、“有病的动物”

尼采说，“人是有病的动物”，因为他要不停的追问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弗洛伊德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当一个人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他就得病了。”（参见辛格，第 2 页）E. 弗洛姆也持相同的观点：“人是唯一自寻‘烦恼’的动物，他感到自己被逐出了天堂。人是唯一发现自己的生存是一个问题的动物，他不得不去解决这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弗洛姆，第 18 页）或许我们会说这是哲人的自以为是，普通人并没有这样的“疾病和烦恼”。确实，一个人可以相当持久地将意义问题忘得一干二净，埋头于眼前的蝇头小利，陷于维持生理需要和物质享受之中，或者热衷于权力的勾心斗角。但是，“生活已经做出了安排，即使最迟钝的、脑满肠肥而头脑简单的人也不可能永远抛开这一问题，死亡及其先兆……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每个人这个尚未解决地、被搁置一边的人生意义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理论问题’，不是无聊的智力游戏，而是**生活本身**的问题。”（弗兰克，第 191 页）

意义问题是生活本身的问题。作为生活的主体，人总是不断地追寻存在与生活的意义，

渴望实现自身的价值。动物，只要生理需要满足就能“生活”得很好，人与动物相比有太多的“毛病”：不仅要满足生存需要，还要满足精神或意义需要；不仅要适应环境和自身的现实，还要超越环境和自身的现实。当萨特讨论自我时，他把自我说成是“永远被追求却永远达不到的东西”，这是因为“人是一个自我创造的过程，因为人所是的意识总是和他所经验的东西保持一段距离。”（参见巴恩斯，第 15 页）我们可以把人的这种特性称为人的“未完成性”：人永远不会变成一个“成人”，他的生存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完善过程和学习过程。人性不是抽象的，人的这种“未完成性”同样也不是抽象的，体现在人的生活之中。“人不仅拥有一个现实世界，而且拥有一个可能的世界。”（鲁洁，第 404 页）换句话说，人不仅拥有现实生活，而且拥有可能生活。所谓可能生活是人根据自己选定的价值理想在精神中建构的生活形式，这种生活形式产生于现实生活之中，又为现实生活提供了目的和意义参照。现实生活永远是未完成的生活，对可能生活的追求同样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正是在这无尽的追求和创造中，生活和生命才获得了意义。

二、死亡意识：意义建构的激发

生活意义建构在一定意义上起源于人的有限感和死亡意识。正是意识到生命总会终结，我们才珍惜生命的每一天，因为每一天都是弥足珍贵的。假如人类真能长生不老，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许多人会因此失去生活的目标，失去应有的创造力，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活着。正如鲍曼所说：“意识到生命的短暂性使得人们只把价值寄托于永恒的延续性之上。这间接地证实了生命的意义：无论我们生命多么短暂，在出生与死亡之间的那段时间都是我们求得超越的惟一机会，是我们在永恒中获得立锥之地的惟一机会。”（鲍曼，第 314 页）死亡意味着人是有限的存在，然而正是由这有限性，人们才渴望无限和永恒；正是因为死亡毁灭人的创造性，人们才创造各种文化成果以超越这种毁灭。

人在生活中时常会陷入现实的琐碎而忘却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但他人（尤其是亲人和熟人）的死亡和人生后半期肌体的变化会使人惊醒。既然死亡是人不可避免的未来，那么，活着或者说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不解决，自我显然难以达到心灵的真正宁静与安顿。”（杨国荣，第 55 页）面对日益迫近的死亡，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所以艾温·辛格认为，“有意义的行为，恰恰来源于我们对死亡的超越”，死亡使“我们能够通过创造和表现价值而克服死亡，这些价值不仅显示了生命的意义，而且推动我们进入更新的生存状态。”（辛格，第 66 页）艾温·辛格所说的价值包括人道的、艺术的和有教养的各种行为。这些价值也可以说是文化成果，它是在继承前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自己创造的文化成果。我们在世界上固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我们建构的文化成就却不会消失。通过这种创造活动，我们得以超越死亡：尽管我已死亡，但我所创造的价值仍然生机勃勃！

三、不是“发现”而是“创造”

“自寻烦恼”的人在追问意义的过程中人并总是能得要领。我们以往对生活意义的追问方式是“发现式”的，似乎在生活之中或生活之外存在着静态、客观的意义等着我们去发现。在人类的思想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都认为存在一个终极的存在和至高的善，而这终极的存在和至高的善为人的生活提供了意义。宗教更是言之凿凿地表明上帝或其它超验的存在，人的生活意义则是由这些超验赋予的。这种依赖外在的存在为自己的生活涂上“意义的色彩”也许是可行的，但终究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有人戏言，上帝创造人之后，它的任务就完成了，因为它赋予人的特性就是创造性，如果人的生活意义还要靠上帝来赋予，那上帝一定会很后悔：还创造人干什么？C·谢·弗兰克虽然笃信上帝，但他也承认：“如果我们的生活是为某种利益服务，即使是为最高的、绝对的利益服务，然而，只要对我们无利或者我们本人不能分享这种利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种生活仍然会是毫无意义的。”（弗兰克，第 214 页）

这种关于生命和生活意义的追问方式，即把意义当作生活外之可以找到的某种存在物，已经被人类精神和社会发展史证明不是好的提问方式。艾温·辛格主张换一种提问方式："我们不再追问那生命的意义，似乎它是某种预先存在的事物。……不管我们是否相信有没有一个先验的意义系统组建了现实，我们都必须追问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如何创造意义的？"（辛格，第 50-51 页）在新的提问方式下，艾温·辛格给出的答案是，意义首先源于对生命的惊奇："我们对生命的惊奇感，伴随着愉悦，不限于偶然的奇遇或辉煌的事件。相反，仅仅活着，仅仅在我们能够从中体会到我们的生命存在的当下即刻，我们就能感到一种欢乐和陶醉。"（同上，第 97 页）按照艾温·辛格的观点，这种惊奇感虽然不是在人的意识的任何时刻都可以出现，对有些人来说还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但这种惊奇感还是提示了一条通往意义的道路："如果我们在真实存在的某个事物上面直觉到一种惊奇，那么我们就会感觉到那种把我们和这个特定的实体联系起来的重要性。"（同上，第 98 页）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生命感到惊奇，我们就会感觉到生命的重要性，感觉到生命的可贵，就有保护生命，使之通过生活得到充实与完善的意愿，意义的创造由此展开。

对生命的惊奇只是意义创造的"初始阶段"。对生命的珍视态度产生了进一步的意义创造：满足自己需要和愿望的不懈努力。满足感的来临"总是来自我们的行为本身，而我们的行为又总是经过精心策划……有意义的人生由这种有目标的行为构成。"（同上，第 126 页）不同的人，需要和愿望不同，行为目标也就不同，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也就不同。所以艾温·辛格认为意义的创造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需要一个中介：理想。这就回到了上文提到理想或可能生活问题。人的需要和愿望是多种多样的，"但人总是从中选择一种最具有价值意义的，作为他的理想"，而理想赋予生存以意义，"人的生存意义只能寓于为实现理想的自主、自觉努力之中。确立和追求理想的过程也是人的生活意义化的过程。"（鲁洁，第 404-405）

四、他者：意义建构的参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不能在生活之外"发现"一个最高实体作为生活意义的最终根据。生活的意义不是"发现"的，而是人在生活中创造的。艾温·辛格的分析有力的揭示了生活意义的创造机制。但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即意义仅仅是人主观的创造吗？应该承认，没有一个统一的意义模式，每个人建构意义的方式和内容都是不同的。但不能由此而走向绝对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将意义的创造仅仅看成单个人的事情。如前所述，生活具有主体间性，人的意义建构和创造也不能脱开这一基本生存境遇，人在意义创造的过程也是与他人、群体、类进行交往与对话的过程。

海德格尔承认与他人共在是人的基本存在境遇，但认为共在是一种非本真性的存在，具有沉沦性，这实际上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极端化。当代哲学对这种观点已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有力的批判。首先，生活意义的创造需要想象和领会，而想象和领会都需要借助具有公共和交往本性的语言，不可避免地先行受到了语言的暗示和制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定意义的创造离不开与他人的交往和对话。由此很多哲学家将"爱"作为人创造意义的基础。莱维纳斯从对待死亡的态度这一视角揭示爱的意义："不是我的存在使人忧虑，而是被爱者或者他人的非存在……他人之死比我本人之死更能使我动感情。这是我对他人的接待，而不是对正等待着我的死亡、作为死亡之参照的死亡的忧虑。"（莱维纳斯，第 119 页）莱维纳斯力图揭示，死亡的意义需要从与他人共在的结构中得到理解，离开主体间关系，不仅死亡的意义，其他一切意义都是不可能的。孙利天由此推论出："意义只能产生于自我与他人、自我与人类的关系之中，而对他人和人类的同情或者说爱又是意义得以产生的对话共同体存在的前提。"（孙利天，第 153 页）E.弗洛姆同样认为与人相连是人最迫切的需要，而爱是最理想的与相连的方式："人身上只有一种感情能满足人与世界结合的需要，同时还能使使人获得完整和个性感，这样的感情就是爱。爱是在保持自我的独立性与完整性的情况下，与自身之外的他人或他物结为一体。爱就是体验共享与交流，它使人充分发挥自己的内在能动性。"

（弗洛姆，第 24-25）E.弗洛姆所讲的人在爱的关系中所体会到的“完整感”、“个性感”及“内在能动性”即是意义创造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生活的意义本身。

社群主义思想家认为，个人生活离不开其所生活的社群，具有构成性特征的社群为有意义的思考、行动和判断提供一种大体上的背景框架。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社群的掌握”，试图躲开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这种背景不仅仅是自讨苦吃，而且是不可能的。这种背景框架不仅是个体生活及在生活中创造意义的基础，也是其生活获得意义和希望的源泉。（参见贝尔，第 86、92、124 页）后现代思想家一般对社群主义是持保留或批评意见的，但作为后现代哲学重要的思想家之一，齐格蒙•鲍曼在个体生活意义建构与群体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却与社群主义有着更多的一致性。齐格蒙•鲍曼指出，个体超越有限性获得生活意义的方式建立在文化上，通过文化建构的“桥梁”使个体从有限通往无限。对死后生命的憧憬是前现代时期最为常用的一种桥梁，现代时期则有用于个体的和“用于公共交通”的两种桥梁。“用于个体的桥梁就是在后世人的记忆中得以永存的种种机会”（鲍曼，第 317 页），这是统治者和社会精英专用的桥梁；“第二种桥梁使人们集体逃脱个体的有限性。个体的永久生存无法获得，但是每一个人无论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都能对未来‘产生影响’，为某种比任何人都更加伟大和持久的东西得以生存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民族，事业，政党，血统或家族。”（同上，第 319 页）具有延续性的群体使个体短暂的生命和生活过程获得了意义，齐格蒙•鲍曼特别指出家庭和民族是能够容纳几乎每一个人的“桥梁”，在个体生活意义的获得与创造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终有一死，但家族和血统则可以摆脱有限性得以长久存在，每一个成员为家族所做出的贡献都在未来延续。任何人都属于一个民族，每一个忠诚的成员作出的贡献都会在民族的永存中得到承认。这样，家庭和民族这类群体就为个体的生活提供了意义基础和源泉。

社群主义和后现代学者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个体生活意义的创造不可能纯粹是个人主观性的活动，必然会以他人、群体这些“他者”为背景和参照，从个人走向他人、走向群体。鲁道夫•奥伊肯精辟地指出，“单个个体只有在和别人紧密联系的情况下才会发展进取：他不可能为自己创造幸福的同时不为他人带来幸福。即使在‘自然状态’下，人也把他的家庭、民族、实际上乃至整个人类作为关注的对象。”（奥伊肯，第 136 页）而以人类作为自身生活意义建构的背景和意义基础则是生活意义创造的最高境界。历史上有很多人在自我意识没有上升到类意识的情况下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也因此而灿烂；也有一些人超越民族与国家的文化视界，站在全人类的高度，自觉自为地肩负起人类发展的责任，这些人的生命和生活也因此而辉煌。

参考文献

[1]艾温·辛格，2001 年，《我们的迷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E.弗洛姆，1994 年，《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

[3]C·谢·弗兰克，2003 年，《社会的精神基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黑泽尔·E.巴恩斯，1999 年，《冷却的太阳——一种存在主义伦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5]鲁洁，2001 年，《超越与创新》，人民教育出版社。

[6]齐格蒙·鲍曼，2002 年，《个体化社会》，上海三联书店。

[7]杨国荣著，1998 年，《理性与价值——智慧的历程》，上海三联书店。

[8]莱维纳斯，1997 年，《上帝、死亡和时间》，三联书店。

[9]孙利天，2001 年，《死亡意识》，吉林教育出版社。

[10]参见丹尼尔·贝尔，2002 年，《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三联书店。

[11]鲁道夫·奥伊肯，2002 年，《新人生哲学要义》，中国城市出版社。

Discuss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life

GAO De-sh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7 , China)

Abstract：Human Being was born with “unhealthiness”, toughly searching the meanings of life all the time. Because Human Being feel life is limited. However, the meanings of life are created, not discovered. In this creating process, the others are important evidence.

Key words：life；meaning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 2005-05-01;

作者简介：高德胜，男，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Email: gao6403@163.com。